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冯玉祥



一、童年苦涩 少年从军

冯玉祥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位著名的爱国将领，他曲折而光辉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下面就让我们从上个世纪开始，在流转的历史时空中，去追寻这位中华优秀儿女的成长轨迹。

冯玉祥，本来名叫冯基善，字焕章。“冯玉祥”这个名字是他11岁那年他父亲的一位朋友替他报名入伍时来不及问他的名字随手写上的。后来他一直用这个名字，本名冯基善反倒很少有人知道了。

冯玉祥的老家在安徽巢县。他的父亲名叫冯有茂，是一个贫苦的泥瓦匠。冯有茂年轻时为逃避兵荒和战乱，和家人一起离开家乡，流落外地。在替一家姓张的财主当佣人时，他利用空闲时间，跟着财主请来教儿子武术的教师学习了一些武艺。由于勤奋刻苦，加上身材生得高大，在陪财主的儿子去参加一次考试时，冯有茂竟考中了武秀才，并在清朝军队中当了一名小军官。此后，冯有茂跟着部队辗转到过新疆、山东、河北等地，冯玉祥便是冯有茂驻扎河北省青县兴集镇时于1882年11月6日出生的。冯玉祥的父母共生了7个孩子，可由于生活贫困，营养不良以及缺医少药，除冯玉祥的大哥和冯玉祥活下来以外，其余5个孩子都先后夭折了。

由于冯有茂职位低下，微薄的薪饷收入很难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冯玉祥从一出生起，就生活在一个艰难的环境中，到他3岁时，为了减轻经济上的负担，全家又搬到保定郊外的一个穷苦的小村庄里居住。在这里，冯玉祥和村里那些贫苦人家的孩子一样，开始了他苦涩的童年。七、八岁时他便和哥哥一起到野外割草拾柴，下地拔麦、掰（p）高粱叶等。这些劳动十分辛苦，若不是亲身经历，是很难想象的。例如掰高粱叶这种活，是在夏季高粱快成熟时，人进到高粱地里掰下高粱杆上的叶子，晒干后当柴火烧。盛夏热辣辣的太阳曝晒下的高粱地里，高粱密密匝匝地长着，一株连着一株，连一丝风都吹不进，整个大地宛如一座巨大的蒸笼，人进到地里，就如同进了一个烤箱，闷热难耐。汗水像雨水似的往下流，头上像紧紧地箍着一个紧箍咒，胸口憋闷得像塞了一团棉花。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小玉祥为了能多掰些高粱叶，帮助父母分担一点生活的担子，常常从早晨直到晚上，赤着脚，挽着裤腿，袒胸裸臂，在地里掰一整天，中间连饭也顾不上吃。到晚上出来一看，脖子、胸膛以及两个胳膊全都起满了密密麻麻鲜红鲜红的痱子。由于过度疲劳，回到家中，不仅不想吃惊饭，甚至连水都喝不进。脑袋和两耳轰轰作响，口腔和咽喉里淤积着一股浓厚而苦涩的粘液，一噎上来就要呕吐。这些劳动不仅使小玉祥亲身体会到了劳动人民的苦楚，同时也养成了他吃苦耐劳的品格。

冯玉祥小时候几乎没有穿过新鞋，大多是穿别人穿过的不合脚的旧鞋，常常是光腿只穿一条裤衩。可是，即使是如此省吃俭用，全家人仍不得不靠典当东西和赊粮度日。每个月上、中旬就要把家中稍值钱的东西包括炕上铺的褥子、盖的被子等都送进当铺，在当铺老板刻薄的挖苦和白眼中当得很少

的一点钱去粮店半买半赊地换点粮食回来 口。好不容易熬到月底父亲关饷了，又得赶快到当铺中把所当的东西赎出来，否则等钱花光了，东西赎不回来，以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冯玉祥小小的年纪便饱尝了生活的艰难窘迫和高利贷的盘剥之苦。

虽然出生贫寒之家，但冯玉祥从小即聪明好学，酷爱读书。只可惜家中实在贫困，他仅上了一年零三个月的私塾，就失学了。虽然再没有机会进学校了，但小玉祥读书学习的愿望却更加强烈。他经常向父亲军营中有知识的人请教，请他们教自己认字写字、谈书说理。没有钱买纸笔，他就用一根细竹管，顶端扎上一束麻，蘸着稀薄的黄泥浆在铁片或方砖上练习写字。想方设法读书写字，是小玉祥苦涩童年中最感快乐和幸福的事了。

随着小玉祥一天天长大，家里的日子却是越来越艰难了，看到日愈拮据的家庭景况给父母带来的无限愁苦，小玉祥最大的愿望就是尽早当兵入伍，多挣一点钱来补助家庭用度。于是他 11 岁时由父亲的朋友帮忙在保定的一个兵营中补了一个空缺，12 岁那年就过早地结束了短暂的童年生活，正式到兵营中当兵，和其他大人一样扛枪训练了。

冯玉祥的少年时代，正值甲午战争前后，他亲眼目睹日本侵略军威胁欺凌中国百姓，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幼小的心灵深感刺痛和屈辱。他暗下决心：“今后不当兵则已，要当兵，誓死打日本。”爱国主义的思想在他心中早早地萌芽了。

二、滦州举义 维护共和

清朝末年的兵营是一个藏垢纳污、极度腐败的场所，当官的一心只想着捞钱，当兵的只知道滥竽充数，混口饭吃。全营上下吃喝嫖赌，风气极坏。就在这种乌七八糟的环境中，冯玉祥却像一枝圣洁的莲花，奇迹般地做到了出污泥而不染。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不仅不让自己沾染种种恶习，而且当差执勤、出操训练等都非常谨慎刻苦。当时有些不三不四的人曾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外国点心”，意思是讽刺他即使训练再刻苦，迟早也会被洋人打死。面对这些讽刺挖苦，冯玉祥却丝毫也没有动摇自己积极向善的信念。几年以后，他不仅遗传了父亲的优势，长得身材魁伟，体格健壮，而且当上了军官。但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当时整个中国都处在饱受外国列强凌辱、宰割、掠夺、瓜分的苦难境地。冯玉祥从亲身的经历中也深深认识到，正是由于政府和军队的腐败无能导致了我国国家抵御外辱的失败。他把希望寄托在当时由北洋军阀组织训练的、使用新式洋枪洋炮的新军身上，希望通过参加这种新建的军队来扫除列强，洗雪国耻。于是，1902年他放弃了在清朝兵营中的军官职位，毅然投奔了新军。

投奔新军以后，冯玉祥越发勤奋地读书，更加刻苦地操练，在各种考核中均成绩优异名列前茅，所以他的职务也升得很快。在此期间，冯玉祥也逐渐接触到了一些近代民主革命的新思想，耳闻目睹了清政府种种丧权辱国的行为，以及吴樾（yuè）等民主志士前赴后继为国家为民族捐躯洒血的义举，都给他的心灵带来很大的刺激和震撼。他逐渐摒弃了原来头脑中存在的“忠君即是爱国”的封建思想，对外国侵略者和腐朽的清政府充满了强烈的仇恨和不满，希望通过变革和斗争改变中国的现状。因此，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接受同盟会的指示，与其所在部队的管带施从云、王金铭等秘密成立了反清组织“武学会”，酝酿起义。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们也于1912年1月3日在滦州发动起义，宣布独立，并成立了“北方革命军政府”，推举王金铭为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冯玉祥为参谋长。但由于起义各部协调统一不周密，在北洋军阀的残酷镇压下，滦州起义很快就失败了。王金铭、施从云两人被杀，冯玉祥被解除军籍押解回乡。

此后不久，在全国革命形势的冲击下，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即宣统皇帝溥仪被迫下诏宣布退位，清王朝彻底灭亡了。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并未落到人民手中，而是被北洋军阀的头子袁世凯窃取了。

袁世凯凭借阴谋和武力当上民国大总统以后，便任用自己的亲信陆建章组建警卫军。陆建章与冯玉祥本是亲戚关系，他深知冯玉祥很有军事才干，加上当时清王朝已灭亡，反清已属无罪，所以，在他的推荐下，冯玉祥重新恢复了军籍，当上了袁世凯军阀部队中右路后备营的一位管带。在随后的几年中，冯玉祥一直跟随陆建章转战陕西等地。由于才干出众，颇得陆建章和袁世凯的器重，很快便由管带升为少将旅长。

1915年，袁世凯违背历史潮流和全国人民的意愿，准备恢复帝制，自己当皇帝。为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对自己的支持，他竟然接受了日本提出的空前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并于1915年12月12日登上帝位，当上了洪宪皇帝。全国人民群情激奋，中国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著名爱国志士蔡锷将军在云南通电全国，宣布独立，反对袁世凯称帝，并组织护国军。分三路向四川、贵州、广西进兵。

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传来时，冯玉祥正率部驻扎在陕西汉中的褒城。他一听到此消息，顿时感到热血沸腾，少年时跟随父亲在大沽炮台服役时，以及庚子年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在保定等地亲眼看到日本兵奸淫掳掠，甚至以中国人当靶子、任意射杀的种种禽兽行径，又历历浮现在眼前。他当即召集队伍，声泪俱下地向士兵们痛述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与民族仇恨，号召士兵们以日本为“假想敌”，刻苦练兵，为国雪耻。

冯玉祥虽受袁世凯的赏识和提拔，但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倒行逆施却极为不满。因为他不仅从思想上赞成共和，还为民国的创立流过血汗。所以，当北洋军阀的军官们纷纷署名通电，并邀约冯玉祥参加支持袁世凯称帝时，冯玉祥严辞拒绝了。他想起了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在武昌起义、滦州起义中牺牲的先烈们，坚决地提出：“宁愿牺牲，定要反对帝制到底！”并召集官兵们发表讲演，宣传反对帝制的道理，鼓励士兵们作好参加反对帝制战斗的思想准备。

1915年底，冯玉祥奉令率他领导的十六混成旅进入四川，配合其它北洋军阀部队抵抗蔡锷将军领导的护国军。冯玉祥入川后，利用军阀系统内指挥混乱的弱点，将部队驻扎于内江等地，迟迟不肯出击，以避免和护国军发生冲突。他顶住曹锟等人频频来电责问、催战的压力，一方面写信给以前滦州起义时的同志刘一清，通过他劝说当时任四川总督的陈宦不要与蔡锷的护国军作对，并要刘一清在合适的时候促成陈宦倒戈起义宣布四川独立。一方面派自己的亲信部下前往泸州前线 and 护国军的刘云峰部取得联系，双方实行了局部停战。接着，又派张之江直接与蔡锷将军会晤，磋商促成四川独立的办法。他自己又直接发电报给陈宦，向他分析国内省内的形势，痛陈是非利害和顺逆之理，劝陈宦早日宣布独立。蔡锷将军也亲自写信给冯玉祥及刘一清，嘱咐他们加紧促成陈宦独立。后冯军驻扎成都东郊时，冯玉祥又亲自入城当面劝说和敦促陈宦。在多方努力下，陈宦于1916年5月20日宣布四川独立。冯玉祥所率部队宣布参加护国军，被编为护国军第五师。冯玉祥的这些行动，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全国的护国倒袁运动，袁世凯在护国狂飚的打击下，被迫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并于同年6月6日在忧惧绝望中一命呜呼了。

冯玉祥促成四川独立，并参加护国军的行为却大大地惹怒了反动的北洋军阀头目黎元洪、段祺瑞等人，他们于1917年4月1日借故免去了冯玉祥的旅长之职。冯玉祥被迫离开部队去北京西部的天台山休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趁西方各列强无暇东顾，企图独

霸中国。于是它一方面与美国签订《兰辛石井协定》，一方面怂恿当时任国务总理兼掌陆军部的段祺瑞参战，许诺借给段祺瑞巨款和军械，以换取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后来，日本又利用段祺瑞与总统黎元洪之间的矛盾，由日本特务出面活动，唆使张勋和段祺瑞相勾结，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拥护溥仪复辟。1917年6月底，在日本侵略者和段祺瑞的支持下，张勋身穿满清袍褂，头垂长辫，率领他的“辫子军”气势汹汹地开进了北京城。6月30日，他逼迫黎元洪“交还大政”，黎元洪被逼出走。7月1日北京城便四处龙旗高悬，推翻数年的清王朝宣告复辟了。

冯玉祥在天台山休养地得知清王朝复辟的消息后，立即派人变卖和典当家产，作为声讨复辟的起义费用。然后，一面派人与驻扎在廊坊的旧部十六混成旅的官兵联络，激励官兵作好战斗准备，一面亲赴天津与陆建章、张绍曾、张之江等商议讨伐复辟的对策。此时退居天津的段祺瑞也打出了反对复辟、征讨逆贼的旗帜，并拉冯玉祥一起参加。7月6日，冯玉祥返回廊坊，重新统领着他那支具有反帝制光荣传统的十六混成旅，在天津附近的马厂参加了讨逆誓师大会，并承担正面主攻的重任。7月9日，冯军就在靠近廊坊的万庄击溃了张勋派来镇压的军队。接着，又和其他讨逆军相配合沿铁路北进，夹击丰台，并率部首先攻入北京。12日晨，以冯部为首的讨逆军向复辟军盘踞的天坛发起了总攻，双方激战到11时，最后讨逆军将复辟军的主力消灭，张勋狼狈地逃入荷兰使馆躲藏起来。这出复辟丑剧仅上演了12天就匆匆收场了。

段祺瑞利用张勋逼走黎元洪，又以反对复辟为名率兵与其他讨逆军一起击败张勋，然后他便重新控制了北京政权。为换取外国借款扩军备战，他多次向日本出卖国家主权，同时拒绝恢复象征民主共和的《临时约法》和国会。为捍卫《临时约法》，1917年9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了护法军政府，自己就任海陆军大元帅，领导云南、广东两省军队及广西、贵州、四川部分军队与段祺瑞控制的北洋军阀北京政府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段祺瑞依仗日本的支持，执行“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的方针，企图通过对南方军政府实施军事讨伐，来实现他“武力统一”的迷梦。

击败张勋复辟军后，冯玉祥也逐渐了解到张勋复辟前后与段祺瑞之间的勾结，对段祺瑞集团非常憎恶和鄙视，对段祺瑞将发动的战争极为不满。当时他曾与吴佩孚、商震、张锡元、王汝勤等9名旅长在北京掌扇胡同军人俱乐部聚会，相约不再参加内战。

1917年，北洋政府的军队在四川、湖南、福建等省连连打败仗，段祺瑞急令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前往福建增援。由于冯玉祥平时敬重孙中山先生的为人，赞成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不愿与护法军交战。所以，他想方设法拖延时间。一开始他借口兵力单薄，要求增加一个补充团，等补充团的新兵招来后，又以津浦线北段遭大水冲毁不能通车为由，迟迟不肯出发。最后，在段祺瑞的严令催督下，才于11月中旬绕道京汉、陇海前往福建。队伍磨磨蹭蹭

地到达江苏的浦口、浦镇后又找借口停止不前。一直拖到第二年的2月，在段祺瑞接连不断的逼令下又才继续开拔。一路仍是走走停停，在经过安庆、九江等地时也一再停留。冯玉祥实在不愿意为反对孙中山先生的护法军政府而打内战，当部队走到武穴这个地方时，他决定不再前进。他决心不管承受多大的压力和危险，也要实施自己反战主和的主张。于是，他接连发出两封通电，要求对南方停战，和平解决南北政府间的冲突。在第一封电报中他阐述了他为什么主和。他认为南北双方没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外国侵略者才是大家真正的和共同的敌人。他在电文中还痛陈了内战给国家、民族和百姓带来的危害。他说，内战使国库空虚，国家靠借外债维持，军队内耗严重，装备缺乏，无数百姓死于战火和瘟疫，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外国列强乘虚而入，国家将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他指责段祺瑞政府坚持打内战是为了少数人的私利而置民意和国家的安危于不顾，是与人民为敌的行为。

在第二封电报中，冯玉祥更明确地提出要求恢复国会，以伸民意。他指出，现在的段祺瑞政府，毁弃了国会等民意机构，因此，不足以代表全国人民之公意。在此情况下打内战，无论胜负，都属自相残杀，即使获得胜利，又有什么光荣可言？他说，若是为公道和正义而战，则虽败犹荣，若是为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私欲而战，则虽然一时得胜，最终必自取其辱。因此，他提出：“惟望国会早开，民气早伸，罢兵修好，时局早定。”并坚决地表示，如仍有不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重，而专以破坏和平、危害国家百姓为能事者，他将与之斗争到底，哪怕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

这两封电报犹如声讨“主战派”的檄文，使段祺瑞政府恼羞成怒。1918年2月25日，段祺瑞下令将冯玉祥革职查办，并派兵包围了冯玉祥的部队。十六混成旅的全体官兵义愤填膺，通电质问段祺瑞政府，要他收回成命，以安军心民心，否则全旅9500余名官兵将誓与旅长冯玉祥共生死。面对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十六混成旅官兵，段祺瑞深感心虚害怕，他担心事态进一步扩大将危及他“武力统一”的大计。最后他不得不收回成命，让冯玉祥“戴罪图功”，继续领导十六混成旅。

三、镇守湘西 督陕督豫

冯玉祥坚决主和、反对内战的言行深得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南方护法军政府的赞许。1918年7月，当冯玉祥率部进入湘西时，与南方军达成谅解，双方并未正式交战，南方军便主动后撤，冯军顺利进驻常德。北洋政府也解除了对他革职留任的处分，令他兼任湘西镇守使，管辖常德、桃源、临澧等县。

冯玉祥任湘西镇守使两年间，一方面秘密与南方军将领往来，优抚慰问南方军将领留在常德等地的家属。一方面积极扩充军队，他总结自己多年带兵打仗的经验，从战术理论、实际操作以及培养干部队伍等方面开始了较有系统的练兵。他不仅要求官兵们练就过硬的作战本领，而且还从思想文化方面对他们进行教育。在部队中组织读书会，编写了若干小册子和军歌，如《军人读本》、《精神书》、《战阵一补》、《告往勳来篇》、《义勇小史》、《国耻歌》等。又将日本军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秘密条款“二十一条”写成通俗的讲解文字，将原条写成字帖，让官兵们既能学习识字，又能时刻不忘国耻。

冯玉祥痛恨当时许多军阀部队腐败堕落，祸害百姓的行径，他给自己的部队制订了较为严格的军纪，注意搞好军队和老百姓的关系，为地方和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如，不入民房、不借民物；公平交易；禁烟禁娼；取缔和整理各大商号滥发的纸币；派军队整理街道，修建桥梁和公路，加固防洪堤坝；设立习艺所和植树造林等等，受到老百姓的称赞。

在常德期间，冯玉祥对侵驻我国沅江的日本军舰采取的坚硬态度，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尤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歌颂。

常德是湘西的一座历史名城，也是一处扼守要冲的兵家必争之地。冯玉祥率军初到常德时，发现常德街头到处贴着日本兵舰保境安民的告示，许多中国人开的商店门口都挂着日本国旗。在自己的领土上，却要日本军舰来保护，冯玉祥认为这有辱国家尊严，立即派人将那些安民告示撕毁。然后他召见日本舰长，严厉地警告他，以后再不许有类似侵害我国主权的不法行为。冯玉祥了解到由于常德为兵家必争之地、历来交战双方无论谁胜谁败、溃逃的一方总是要大肆抢劫一番，又还常有散兵游勇和土匪强盗来趁火打劫，商家迫不得已才挂日本国旗，以求得日本军舰庇护的情况后十分痛心，立刻召集商人开会。在会上，他申明大义、晓以利害。他说：“我相信稍有血性的中国人都明白依靠外国人庇护是最可耻的事。你们以前为溃兵骚扰，大家不得已而做这样的事，现在，我们队伍是严守纪律的，一定能承担保护地方的责任，绝不会再有骚扰之事发生。如果我的士兵动了你们的一草一木，就请你们把我冯某逮捕枪决。请大家回去后，立刻把日本国旗取下销毁。今后永远也不要再做这种辱国辱己的事了。”接着，冯玉祥又派人将出售日本国旗的中国奸商和日本浪人绳之以法。

当时，内乱频仍，国无宁日。为维护地方治安，保护常德人民安居乐业，冯玉祥特别加强了城内治安，他派士兵把守城门，检查过往的可疑之人。一天，几个日本水兵大摇大摆地要从南门进城，守城士兵对他们进行检查，他们不仅拒绝检查，其中一个日本兵反而先动手打了我国士兵一个耳光。我国士兵怒不可遏，端起刺刀和日本兵拼搏，刺伤了其中3个日本兵。事后，当地日本侨民居留会会长高桥新二和日本舰舰长求见冯玉祥。高桥气势汹汹地声称：“本国水兵伤势很重，我代表日本国政府向你们提出强烈抗议！”冯玉祥不动声色地问：“你打算如何解决此事呢？”高桥和日本舰长提出，先把中国“行凶”士兵关押起来，再谈解决办法，并说这是依照《日本海陆军刑法》第xx条规定处置的。说着话，日本舰长还掏出《日本海陆军刑法》的小册子指指点点。冯玉祥一看怒不可遏，立即脱下一只鞋，要用鞋底抽日本舰长10个嘴巴。他理直气壮地指出：“用日本军法来处置我国士兵，这是对中国的侮辱，所以我要用鞋底来教训你们。我们中国有中国的军法，按我国的军法规定，士兵有权检查任何一个进城的人，若对方不接受检查，即是奸宄匪徒。我们的士兵忠于职守。打伤了一些匪徒，我要大大地给予奖赏。”高桥和日本舰长恼羞成怒，威胁要上告日本天皇和段祺瑞总理。冯玉祥轻蔑地说：“我冯某人前不久在武穴通电全国，就是反对段总理的，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你们快去和段总理交涉，叫他来惩处我吧。告诉你们，我冯玉祥只知道真理，只知国法，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怕！”面对冯玉祥义正辞严的态度，高桥和日本舰长理屈辞穷，像泄了气的皮球，不得不用商量的口气求得妥协，提议双方互派代表看望对方伤员，并愿意先来看望中方伤员。

在驻兵湘西期间，冯玉祥加强了与南方军的往来，并与孙中山先生建立了政治联系。1920年7月，冯玉祥率部撤出湘西，北进途经汉口时，曾致信给孙中山，述说当时自己处于北洋军政府控制下的矛盾和困苦，表示自己现时虽因环境所限，不能追随孙中山先生左右，但在精神上却早已和孙中山先生结交契合了。孙中山先生收到此信后，派徐谦、钮永建等带着自己的亲笔书信前往汉口向冯玉祥表示慰问。1920年11月孙中山由上海回到广东，冯玉祥又派他的秘书任右民在越秀楼拜会了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曾向他们提出：“决将联络苏联。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只有苏联。”

1920年7月，北洋军阀内部直系冯国璋与皖系段祺瑞的争权夺利，导致了直皖战争爆发。经过一场狗咬狗的争斗，段祺瑞战败，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了北京政府。因冯玉祥早在武穴主和时就有反对段祺瑞的行动，所以被提升为11师师长。不久，又被委任为陕西督军，率部进驻西安等地。

冯玉祥督陕期间，依旧每日亲临操场，训练军队。他虽属旧军阀队伍中的一员，但却与其他军阀不同，始终保持着鲜明的反帝爱国思想。每逢日本提出灭亡中国之“二十一条”的“五七”国耻日，他总要集合部队，进行训话。让官兵们吃印有“勿忘国耻”四个红字的窝头，同时唱雪耻歌。歌中唱

道：“这些饭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帝国主义，人民之敌，复仇雪耻，我辈天职。”唱毕还要讲述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罪行。并鸣炮十余响以“震醒醉生梦死的中国人”。

在练兵的同时，也仿照镇守湘西时的经验和办法来处理地方事务。如整顿银行滥发的纸币；令财政当局增加充实教育经费，在各城镇广泛设立平民学校，兴办教育；禁烟、禁娼、放脚、植树等。又派军务课长石敬亭督率官兵参加修筑以西安为中心，东至潼关，西至凤翔，北至三原，西北至平凉的四条公路。击溃了经常出来骚扰百姓的土匪和一些散兵游勇。

对于那些侵害国家民族利益的外国人，冯玉祥始终坚持寸步不让，毫无奴颜媚骨。在他任陕西督军时的一天，美国人安德思和英国人高士林，未经任何人允许，擅自在终南山中猎获了两头野牛。冯玉祥知道此事后，向他们严正指出，外国人私自猎杀中国领土内的野牛是违法行为。高士林却狡辩说，我在中国15年，所到之处没有不准打猎的。冯玉祥凛然地说，你以前没有遇到过官府禁止你们行猎，那是因为他们睡着了，但我并没有睡着！终南山是陕西的辖地，我现在是陕西的地方官，负有国家人民交托的保护领土维护主权的责任，因此，我非禁止你们不可。他责令安、高二人把两头野牛送回终南山，并赔偿损失。安、高二人在冯玉祥的严斥下，不得不认错并保证以后不再犯。冯玉祥这种保土维权的爱国行为，得到了当时舆论界的一致称赞。

冯玉祥在陕西期间，一直保持着与孙中山先生的联系。他遵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与陕西胡景翼领导的靖国军合作，后又将靖国军改编为陕军第一师，为后来与胡景翼联合发动北京政变打下了基础。他还通过马伯援向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五条请教意见，表达了他将孙中山先生看作民主共和的领袖以及自己拥护共和、共同救亡的意愿。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奉令调任河南督军。半年后，受吴佩孚等人的排挤，被免去河南督军之职，调赴北京任陆军检阅使，驻扎在南苑、通州等地。

四、北京政变 驱逐溥仪

受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直系军阀，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打败受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奉系军阀后野心进一步膨胀。他们从英、美帝国主义那里得到了更多的军费、军火，又通过英帝国主义与广东军阀陈炯明等相互勾结，企图推翻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权。对于革命人民，也采取了血腥的镇压手段。1923年2月7日，吴佩孚制造了镇压京汉铁路罢工工人的“二七”大惨案。这年6月，直系军阀的另一头目曹锟在驱逐总统黎元洪后，以每张选票5000元的价码，演出贿选总统的丑剧，把自己推上总统宝座，把持了北京政权。从而，直系也成了全国最大、最反动的军阀集团，深为全国人民所痛恨。

冯玉祥自担任11师师长以来，名义上虽归属直系，但他的思想、作风等却与其他直系军阀格格不入。他对贪财好色、昏庸无能的曹锟和刚愎自用、残忍专断的吴佩孚深为不满。特别是“二七”惨案和贿选丑剧发生后，他对这两个军阀头目完全失掉了信任，决心选择适当的时机与他们彻底决裂，另觅救国救民之路。恰在此时，孙中山先生也派人来到冯玉祥军中，劝说冯玉祥在适当的时候联合奉系和段祺瑞的力量，推翻最大、最反动的直系军阀。

1924年秋天爆发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终于为冯玉祥提供了等待已久的机会。

1924年9月，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吃了败仗的奉系军阀，经过两年养精蓄锐、整军备战后，数十万人马在少帅张学良的率领下，直扑直系控制的热河、榆关等地，引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等直系军阀也调兵遣将，迎敌应战。他们任命冯玉祥为第三路军总司令，令冯军经密云、古北口、滦平等地向开鲁前进，会合第二路军进攻奉军的侧面。冯玉祥接受任务后，立即与第二路援军司令胡景翼、北京警察副司令孙岳等秘密联络，约定在适当的时机回师北京，发动政变。

10月19日，冯玉祥军到达古北口后，接到了吴佩孚催他迅速出击的急电，他认定行动的时机到了，当即命令鹿钟麟先行秘密赶赴北京，会同孙良诚、张维玺等人安排北苑防务以及入城的警戒任务。又派人直驱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两条铁路的交通。自己随即亲率部队昼夜兼程，赶赴北京，并向孙岳、胡景翼发出了简便行动的信号。冯玉祥军仅用了3天时间，徒步行军六、七百里，于10月22日回到北京。在孙岳部队的配合下，冯军半夜时分由安定门入城，未费一枪一弹，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总统府卫队的武装解除了，同时迅速占领了车站、电报局等要害部门。

23日，冯、胡、孙联名通电全国，呼吁停止内战，共建和平。25日他们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组织了“中华民国国民军”和“临时摄政内阁”，冯玉祥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分任副总司令和二、三军军长。冯玉祥等人还决定立即发电报给孙中山，请他来北京主持国家大计，并派马伯援专程前往迎接孙中山。

吴佩孚听到北京政变的消息，大为惊恐，急忙调兵来救，但救兵刚到天津附近就被冯军击败，吴佩孚惊慌失措，只得从塘沽登舰仓皇南逃。直系军队也随之土崩瓦解，奉军则乘势长驱直入，迅速占领了滦州、唐山、秦皇岛等地。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还办了另一件轰动全国、大快人心的事，那就是将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了紫禁城的皇宫。本来，按照清帝退位时与民国政府达成的协议，溥仪早就该搬出皇宫了，但由于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等人的姑息纵容，溥仪不但得以长期赖在宫中不走，而且还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国中之国”。溥仪在这个小朝廷中继续称孤道寡，对他的追随者们发布“上谕”，举行跪拜大礼，并且不遵守民国的历法，仍使用宣统年号。更有甚者，每逢民国政府总统换任，还要派遣“专使”以外国君主礼前往清宫送国书，问安好。1922年12月溥仪结婚时，在民国大批军警的警戒护卫下，清宫的龙车凤辇、旗伞仪仗、黄亭宫灯等竟然浩浩荡荡地在紫禁城外的北京街道上大大招摇过市。这些奇怪的现象早就引起了广大民众的不满，并遭到国外舆论的讥讽。

早在讨伐张勋复辟之时，冯玉祥就有驱逐溥仪的想法，但由于段祺瑞的阻挠而未实现。北京政变以后，11月4日摄政内阁会议通过了让溥仪自废尊号，搬出故宫，修改清室优待条件的决定。次日一早，冯玉祥派警备司令鹿钟麟带人来到故宫，执行摄政内阁会议的决定，要求溥仪在3小时内搬离故宫。两位太妃寻死觅活，说什么也不肯走，鹿钟麟等人又把限期推迟到下午3点，可到了时间，他们仍赖着不肯走。最后鹿钟麟说：“再给你们20分钟，若再不走，就要从景山上开炮轰击了。”这句恐吓的话果然十分奏效，不一会儿溥仪和众皇族们终于坐上国民军准备的汽车离开了爱新觉罗王朝盘踞了数百年之久的故宫。消息传出，举国称快，当时在广州的孙中山专门致电冯玉祥，深表赞许。

北京政变以后，冯玉祥经常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往来，并通过李大钊的介绍，结识和会晤了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在徐谦、于右任等国民党人的帮助下，冯玉祥依据孙中山先生的联俄政策，要求苏联派遣顾问团到国民军中帮助训练军队。李大钊经常和冯玉祥一起谈论、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向冯玉祥及其部下解释和宣传中国共产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等政治主张。这些宣传工作，对冯玉祥思想认识的进步起了积极的作用。冯玉祥曾秘密嘱咐部下，对群众的革命行动要保护。他还通过种种关系帮助共产党救出了“二七”惨案以来被捕的工人领袖，恢复了各铁路失业工人的工作。于是，在较短的时期内，铁路工人运动又得以重新发展起来。

冯玉祥与李大钊等人的频繁接触，以及接受苏联军事援助等革命倾向，引起了各派反动军阀的极大恐慌。在帝国主义的撮合支持下，奉系直系军阀又勾结在一起，并联合直鲁各军以及阎锡山的晋军，成立了所谓的“反赤大

联盟”，矛头所指，不仅是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也包括当时的中国国民党和冯玉祥等人领导的国民军。在直奉军阀的排挤下，势单力薄的冯玉祥被迫于1926年1月1日通电辞职，并于同年3月21日取道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前往苏联游历考察。国民军在鹿钟麟等人的领导下于1926年4月推翻段祺瑞执政府后也迅速撤出北京，主力沿京绥线退往南口一带。尾随而至的数十万反动“讨赤”联盟军将退守南口的国民军四面包围，必欲全歼之而后快。国民军凭借坚固的工事与敌军抗衡了3个多月，终因力量对比悬殊、给养军械补充困难、友军之间被截断等原因，被迫于8月18日突围撤退，在付出惨重的代价后，所存无几的队伍陆续退入人烟稀少、村落穷僻、环境恶劣的塞外西北。

北京政变以后，孙中山先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决定应冯玉祥等人的邀请离粤北上。1924年11月13日从广州出发，12月4日抵天津，冯玉祥派参谋长熊斌前往欢迎。不料孙中山先生因肝病发作，一直到12月31日才抱病抵达北京。此时北京政权已为段祺瑞等人控制，冯玉祥也受排挤离京出任西北边防督办。不久，孙中山先生就病逝于北京。冯玉祥一直将孙中山先生看作自己精神上的引导者和最理解自己的人，称自己是一个未入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信徒。听到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噩耗，他深感震痛，下令国民军全体官兵为孙中山带孝7日表示哀悼。他以未曾与孙中山先生亲自见上一面为终身遗恨。

五、五原誓师 力主北伐

北京政变后，由于种种原因冯玉祥不仅未能实现救国救民的宏愿，反而受到各反动军阀的联合排挤和围攻，军事上节节失利，加上孙中山先生逝世带来的压力，使他陷入了失望、彷徨之中。在此之前由于他与孙中山先生及其他国民党人士有较多的往来，又在共产党直接和间接的帮助下，接受过苏联的军事援助，对苏联有一些认识，因此，1926年初，失意、彷徨的他决定远赴苏联，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在赴苏途中，他结识了广州的国民党代表以及鲍罗庭等人，正式加入了国民党。5月9日，冯玉祥抵达莫斯科。在这里，他会见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等苏联领导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人蔡和森也会见了冯玉祥，并对他及其随行将领阐述和解答了共产党的主张以及国民革命的意义。在苏联，冯玉祥还访问了工人、农民、士兵，参观了军校、农业部等单位。所到之处，无不强烈地感受到苏联十月革命后欣欣向荣的胜利景象。

苏联之行对冯玉祥后半生的转变有着巨大的影响，它使冯玉祥对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国民革命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也坚定了他继续参加国民革命的决心。冯玉祥认为自己在苏联找到了中国将来发展的榜样，并认识到革命要取得彻底的成功，“必须有鲜明的主义及正确的党为之领导”。因此，在莫斯科，他为国民军全体将士办理了集体加入国民党的手续。

1926年7月，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开始了，冯玉祥闻讯十分感奋，他决定立即回国参加这场讨伐反动军阀的战争。1926年8月17日，冯玉祥秘密离开莫斯科回国。途中遇到了南口溃败后退入西北的一些国民军零散部队，冯玉祥便着手把他们重新组织在一起，鼓舞和激励他们重新树立起革命的信心。9月16日，冯玉祥抵达内蒙古包头附近的五原，与原国民军将领孙岳、方振武、徐永昌等相会，决定组织国民军联军，响应北伐。次日，冯玉祥在五原主持了誓师大会，发表宣言，宣誓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在宣言中，冯玉祥回顾了自己前半生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剖析和展示了自己从一个清朝士兵成长为民主革命者的历程，表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决心。他在宣言中说：“玉祥本是一个武人，半生戎马，未尝学问，唯不自量，力图救国，无奈才短识浅，对于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领。所以飘然下野，去国远游。及至走到苏联，看见世界革命起了万丈高潮。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受国外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双重压迫。革命运动早已勃兴。又受世界的影响，民族解放的要求，愈加迫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即由此而生。于是我明白了救国的要诀已经由他开辟了道路。中山先生说的好，行易知难。我既是知道了，自然是刻不容缓地马上干起来。又因最近中国的国民从国民军退后，受压迫比以前

更厉害。我的热血沸腾起来，情不获己，遂赶快回国，与诸同志上革命战线，共同奋斗。我这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走的时候，不是洁然鸣高；来的时候，不是什么东山再起。”

接着，他回顾了自己从滦州起义到北京政变乃至推翻段祺瑞执政府的经历，并且说：

“我虽然作过几点革命事业，我却没有鲜明的革命旗帜。因为我对于革命，只有笼统的观念，没有明确的主张。革命的主义，革命的方法，在以前我都没有考察。所以只有一点两点改革式的革命，而没有彻底的作法；我也赤裸裸的说出来，好使国人知道我所作的忽而是革命，忽而又不像革命，其缘故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就革命的观点上说，过去若说是一个中国革命者，是一个中山主义者，我都不配。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世界革命的话，更是说不上。不意当时有人说我是赤化了。现在看起来，真是惭愧！当时的冯玉祥，哪里够得上赤化！”

谈到中国军阀统治现状，他分析指出：

“军阀何以如此呢？军阀本身实在无力量，乃是帝国主义在背后支持。因此我们知道要想战胜军阀，必须先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在中国压迫之甚，几使中国不能生存。工人农民及一切受苦受难的人，为什么这样苦？这样穷？就是帝国主义所给的。帝国主义的各国，强迫中国订下了许多不平等的条约，于是在中国有租界，有租界地，有海陆军驻扎权，有航行权，有领事裁判权，修铁路，开矿山，把持中国的海关，强制中国行协定关税。压迫剥削，不一而足。……如此，中国只得穷困，而且穷到死的地步！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把中国弄穷了；又用政治的侵略，陷中国于危境。……其最厉害的，是利用中国军阀压迫民众；又唆使军阀互相战争不已，以巩固其在华之权利，遂使民国成立十五年，年年都有战祸。已经被它弄穷了的中国，又加上十几年的战争，于是农民、工人、商人、学生、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士兵及一切民众，穷的穷死，其原因都在于此。”

面对灾难深重的国家和人民，冯玉祥立下了掷地有声的誓言，他说：

“痛苦的来源，已经求出来了。我们要解除这深切的痛苦，惟有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我就投袂而起，与革命同志们共同担负这个使命。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今后将国民军建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要结合。军队所在的地方，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均当帮助。并联合其他民众之团体，共负革命之责任。同时对于学生、教员、商人、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各阶级之利益，均极力顾全。意义是解放被压迫之中国民族。以与世界各民族平等；解除军阀之压迫，使工人不受剥削，农民不受穷苦，商人不破产，学生有书读，教员及机关职员都有薪水发，新闻记者不发生生命的危险，以及其它人民的痛苦，均为解除。”

五原誓师，在中国的大西北燃起了武装讨逆的火炬，它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刚从广东开始的北伐战争。冯玉祥毅然作出五原誓师的果敢行动，是同他赴苏考察所受的影响分不开的，也是在冯玉祥军中工作的刘伯坚等共产党员努力推动的结果。它表明冯玉祥在思想上、政治上都踏上了一个新的起点。他所率领的国民军也从旧军阀部队中分裂出来，成为站在国共合作旗帜下的革命武装。

五原誓师后，冯玉祥立即着手召集回南口大战后四散各地的旧部。在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后他接受李大钊的建议，确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方针，于10月指挥部队进军陕西，击溃了奉吴佩孚之令围困西安长达8个月之久的镇嵩军，解了西安之围。同时，冯玉祥故意在大余台、石嘴子等地布置设防，用虚虚实实的战术吸引了部分奉系兵力西进，以减轻南方北伐军的压力。

西安解围后，冯玉祥指挥部队乘胜追击，攻下潼关、商雒、同州等地。1927年1月26日冯玉祥进驻西安，命令各部陆续向东开拔，在关中集中，准备出师潼关，声援豫鄂。

3月上旬，国民军联军各部陆续集中关中。当时，奉军已进入河南许昌、郾城一带；在长江中下游苏、皖两省，北伐军与直鲁军阀联军以及孙传芳的军队，激战正酣；而同时，直系残部于学忠正勾结四川的杨森和湖北北部的反动军阀，阴谋偷袭由广州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革命形势十分危急。3月19日，冯玉祥发布出师文告，命于右任、刘郁芬分任驻陕、驻甘军总司令，镇守后方；令刘镇华为东路军总司令，进军河北，其余部队分三路向鄂、豫、晋、绥四省出击。

4月底，武汉国民政府按北伐军统一编制将冯玉祥所指挥的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任总司令。5月6日，冯玉祥亲赴潼关指挥战斗。冯军与奉军在河南展开了激战。5月25日，冯军攻占洛阳。27日，攻克孟津。30日，冯军骑兵攻入郑州，并进一步向荣泽、开封方向追击。31日，冯军张华堂旅占领开封。6月1日，北伐军唐生智部也赶到郑州。6月2日南京方面来的北伐军也攻下了徐州。冯玉祥部与北伐军在中原胜利会师。此时，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已发展至数十万人，成了北伐军的一支主力队伍。

也就是在此期间，传来了李大钊等人在北京被奉系军阀残酷杀害的消息。冯玉祥闻讯，异常悲愤，哭得十分哀痛。他为李大钊举行了追悼会，评价李大钊是“自‘五四’运动以来思想界的泰斗”，是“指导国民革命运动最忠实最努力和最有力的领袖”。他下令全军为李大钊致哀，并要求将士们将哀悼与怀念化作对敌人的义愤和消灭敌人的决心。

就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和全国工农运动迅猛发展的时候，以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开始从内部破坏革命的联合阵营，他们接连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蒋介石还在南京另立了一个反动的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

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以及历史和自身的局限，这一时期的冯玉祥尚未认清蒋介石等人的反革命真面目，因此，曾一度追随蒋介石滑向反共的歧途。另一方面，冯玉祥反对内战、力主北伐，以扫清反动军阀势力的决心一直没有动摇。正是在冯玉祥等人的坚持下，1928年4月，蒋介石在徐州再次誓师，接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大集团军分进合击，于同年6月底彻底打败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安国军，占领了北京、天津等地。至此，“北伐大业”终告完成。

六、中原大战 兵权旁落

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出于建立自己独裁地位的需要，为了在军事、政治等方面取得更强有力的支持，曾对冯玉祥大施讨好笼络手段，并于1928年2月18日在开封与冯玉祥结拜为兄弟。

随着北伐的推进，原来的旧军阀一部分被消灭，一部分以换帜的形式与蒋介石等新军阀合流，蒋介石的羽翼也一天天丰满起来。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北伐战争刚一结束，蒋介石便开始了他的排除异己，建立一姓天下的活动。

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在参加北伐的几个军事集团中是实力最雄厚、功勋最卓著的一个。但在北伐胜利后，他们却深受蒋介石的排挤和打击。这些排挤和打击首先表现在地盘分配问题上。本来打垮张作霖的安国军、夺取平津地区主要是得力于冯军，而且冯玉祥军事集团的官兵们一直把平津地区看作是他们的原国民军固有的地盘。但夺取平津后，蒋介石却把它划给了参战最晚、功劳最小的阎锡山。蒋介石自己也占据了江浙和南京、上海地区，却把最贫瘠的陕甘宁地区划给冯玉祥。这种厚此薄彼的作法引起了冯军集团官兵们的强烈不满。接着，在军队的编遣问题上，蒋介石又与阎锡山勾结，合力制裁冯玉祥。蒋介石等人提出所谓对等缩编的原则，提议冯、蒋两部各缩编为12个师。当时冯玉祥的军队人数是蒋介石军队的两倍，按蒋介石的提议缩编，冯军便大大地吃了亏。而蒋介石手中除了缩编后的12个师外，还另掌握着中央编遣区的11个师，实力大增。冯玉祥不满蒋介石的排挤打击，便以种种理由与之对抗，蒋介石更借中央的名义，强调“集中”、“统一”，进行压制。双方矛盾愈演愈烈，最终酿成战火。

1929年5月19日，冯玉祥召集他的将领在华阴开会，宣布准备对蒋开战，并部署了作战计划。冯军尚未正式行动，冯部中曾受蒋介石拉拢收买并一直与蒋介石保持秘密联系的韩复榘、石友三等人却突然率部背叛冯玉祥投靠蒋介石。韩复榘、石友三都是冯玉祥手下的著名战将，他们的反叛，不仅使冯军集团兵力大受损失，而且严重地动摇了军心。冯玉祥在此打击下，只好宣布下野，暂时放弃了反蒋的计划。

就在冯玉祥为第一次反蒋失败而倍感忧愤之时，山西军阀阎锡山却以愿意与冯玉祥一同出洋和共同反蒋等谎言，将冯玉祥骗到山西太原软禁了起来。企图通过挟持冯玉祥及冯军集团，增加自己的实力，独霸北方半壁江山，与其他军阀抗衡。

冯玉祥被软禁后，冯军集团的宋哲元等人曾与阎锡山相约联合反蒋。同年10月，宋哲元出兵潼关后，阎锡山却违背诺言，按兵不动。冯军在蒋军和唐生智部的夹击下，损失惨重，很快便失败了。

到1930年初，蒋介石逐渐打败了除阎锡山以外的其他军阀，征讨的矛头直指阎锡山。与此同时，冯军集团的官兵们因不满阎锡山背信弃义、软禁冯

玉祥、欺骗宋哲元等行为，也秘密与蒋介石联络，准备联合讨伐阎锡山。阎锡山见此形势，知道继续囚禁冯玉祥对自己不利，便于1930年3月，将冯玉祥释放，并向冯玉祥表示自己这次愿意真诚合作，联合反蒋。冯玉祥获释后，立即组织联络各方面反蒋势力，形成了以冯军、晋军为主力的军事、政治反蒋大联盟。5月4日，阎锡山与冯玉祥在郑州召开军事会议，进行了作战方略的具体部署。

5月11日，反蒋联军与蒋介石军队开始大规模接触，民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了。

中原大战开始后，双方调动了近百万的兵力投入战斗，其中冯阎联军众达60余万，几乎是蒋军的2倍。联军在冯、阎二人的指挥下，向蒋军发起了凌厉的攻势，致使蒋军一度全线动摇，要求停战议和，冯阎联军未予理睬，继续发动攻势。眼看大功在即，可就在此时，蒋介石却拉拢了东北军的张学良，让他出兵帮助自己。于是，数十万东北军开进山海关，对冯阎联军形成了夹击之势。阎锡山见势不妙，便收缩战线，从华北迅速退入山西自守，正在中原苦斗的冯军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其退回西北的咽喉之地洛阳也被蒋军攻占，于是军心大散，全线崩溃，地盘也丢失殆尽。

1930年10月，历时近5个月的中原大战以冯、阎联军的失败而告终。冯玉祥苦心经营20余年的军事集团，至此完全土崩瓦解，其部众大部分投降了蒋介石，一部分被东北军收编。冯玉祥被迫于10月23日再次通电下野。此后，冯玉祥除1933年在张家口与共产党合作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以及抗战初期曾短期出任过战区司令长官外，也结束了他长达30余年的军旅生涯。

七、义赴国难 组织察盟

1930年中原大战反蒋失败后，冯玉祥军事集团土崩瓦解，冯玉祥从此离开了他苦心经营20多年的军队，仅带着一个团和西北军官学校的残部隐居于山西汾阳的峪道河。在汾阳隐居期间，冯玉祥开始反省自己失败的原因，逐步认识到，自己的军队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正确、鲜明的政治主张，没有正确的思想作为指导。为了寻求正确的政治主张，冯玉祥开始系统地阅读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包括《资本论》等系列经典著作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文件。他还聘请李达等人為自己讲辩证唯物主义、政治斗争原理，邀请共产党员肖明、张吾来等人共同分析国内国际形势，讨论中国革命问题。通过这些学习和讨论，冯玉祥对共产主义理论有了一些了解，对共产党也增加了好感。他在1931年8月的日记中写道，共产党的主义“真光明正大”，甚至产生了“只有入共产党最好”的想法。因此这期间他又重新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他同意中共在他所办的军校中发展党的组织。当他听说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缺少通讯工具时，立即变卖掉自己在北京的一所住房，用卖房的钱购买了一部电台赠送给中共中央。这一切都表明，冯玉祥在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后，又朝着与中共合作的进步方向前进了。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执行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千里江山节节沦丧。冯玉祥听到“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义愤填膺，肝胆欲裂。于9月23日首先发表通电，谴责蒋介石媚外误国、执行不抵抗政策的罪行，指责蒋介石政府企图依靠国联来解决日本侵略中国问题的作法是“与虎谋皮，自欺欺人”，是“甘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而不悔”。主张“团结全国民众之力量，一致对外”，“督促全国军队，开赴前线及各重要口岸，正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雪此无上之奇耻”。他认为，“中国存亡，在此一举”，并坚定地表示“誓死与全国同胞共赴国难，粉身碎骨，义无反顾”。10月21日、25日又两次发出通电，提出了13项抗日救亡的具体主张，并向正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提出了“以武力恢复东北失地”等3个提案。在此国难当头之时，冯玉祥抛弃了个人得失，带着抗日救国的夙愿，于1931年12月离开隐居的山西南下，奔走于南京和上海，疾呼“精诚团结，抗战救国”。“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企图侵占上海，作为进攻中国内地的基地。于是在1932年1月28日夜，他们借口日本和尚被殴打，向上海闸北一带进攻。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战。上海各界人民也纷纷行动起来，组织了抗日义勇军、运输队、救护队等，积极支援前线。十九路军英勇顽强，杀敌万余人，使日本侵略者受到沉重打击，几度更换司令。消息传来，冯玉祥非常振奋，高度赞扬十九路军英勇可嘉，并向南京政府提出迅速派兵10万增援上海，从沿海口岸炮击日舰，同时集中北方军队反攻东北等建议。但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对他的建议却置之不理。十九路军在上海陷入孤军奋战，处境日益艰难。冯玉祥忧愤交加，竟病

倒了。在病中，他又向蒋介石、汪精卫提出希望能给他一些军队，他愿亲自带兵上前线，指挥作战，以遂抗敌救国之志。但这些请求也被拒绝了。当蒋介石政府决定和日本侵略者签订淞沪协定后，冯玉祥更感抗日有志而报国无门，一腔热血无处洒，于是怀着无比愤懑的心情于1932年3月借口有病离开南京，转辗前往泰山居住，等待寻找报国的时机。

冯玉祥人在泰山，心系抗日，他专门在泰山五贤祠旁的石亭内写了一条标语：“你忘了没有，东三省被日本占了去。有硬骨的人，应当去拼命夺回来！”时时警示自己不忘国耻。他更加用心地学习革命理论，并接受共产党的建议，积极与过去的部下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佟麟阁等联系，准备积蓄力量，进行武装抗日活动。

1932年底，日寇集结大量兵力，准备大举进犯热河，同时向山海关发动攻击。1933年1月2日，攻陷山海关，2月25日开始向热河及长城各口进攻。一周后，热河省会承德被攻陷。日寇进一步分兵向平、津及察哈尔入侵。华北危急！在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热情推动下，驻长城一线的官兵和长城内外的义勇军奋起抗击。但蒋介石政府仍采取不抵抗政策。冯玉祥一方面多次发表电文，抨击蒋介石的妥协政策足以亡国灭种，一方面积极鼓励和支持长城一线的抗日斗争，并自己出钱购买了一万件皮衣赠给长城抗日将士。

为了与共产党合作，共同组织民众抗日力量，冯玉祥在1932年10月便由泰山移住张家口，准备利用宋哲元担任察哈尔省主席的有利条件，在察哈尔树起抗日的大旗。1933年2月，冯玉祥与共产党派来的代表宣侠父、张慕陶等人开始商讨抗日的具体计划；同时派人去天津和两广、上海等地与吉鸿昌、石友三等联络，吉鸿昌等人纷纷响应冯玉祥的号召。蒋介石、汪精卫知道冯玉祥准备抗日后，十分惊慌，接二连三地派人来游说，企图引诱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冯玉祥在共产党的推动和指导下，态度坚决，不为所动。他对蒋、汪的说客说：“谁要是亲日妥协，谁就是我的敌人，决无合作之可能。”蒋介石在3月6日发出“侈言抗日者杀勿赦”的命令，冯玉祥也不为所屈。他对劝他离开张家口的人说：我是下了决心要抗日的，能动30万兵就抗30万的，能动2万兵就抗2万的。即使我一个兵也弄不动，我一个人爬到房顶上，拿着两杆枪，打死一个日本兵就够本，打死两个就赚一个。他表示：“宁为抗战而死，也不愿离开此地！”

1933年5月26日，在冯玉祥的组织领导下，齐集张家口的各军、各地区、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共议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大家共同推举冯玉祥为同盟军总司令。冯玉祥当即就职，同时通电全国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蒋介石政府的妥协政策，表示自己决心“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团结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求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是对国民党妥协政策的有力一击，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各地零散的抗日队伍纷纷前来加入同盟军。至6月中旬，抗日同盟军的队伍已达十余万人。

抗日同盟军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决定了军事、政治等纲领，并任命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邓文为左副指挥，李忠义为右副指挥，率兵分三路向察北地区出击。同盟军接连收复康保、宝昌、沽源等地，连战皆捷，士气大振。7月初，同盟军大军直指察北名城多伦。当时，驻扎多伦城的敌军是日寇茂木骑兵旅团和伪军李守信部，共计有日军3000余人、伪军数千人。敌人在多伦城外修筑了32座炮台和各项坚固的工事，配备了精良的武器，甚至出动飞机助战。整座城市易守难攻。吉鸿昌、邓文、李忠义等亲临前线，率领同盟军与敌人展开了激战。冯玉祥总司令也向前线发来电报，激励将士们英勇杀敌以死报国。经过5昼夜的血战，同盟军毙敌1000余人，终于在7月12日攻克多伦。察哈尔东北各县随之完全光复。在此形势下，冯玉祥决心要亲自率军乘胜收复东北四省的失地。7月27日，在张家口成立了“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冯玉祥任委员长。他又在张家口主持修建了一座抗日牺牲将士纪念塔，塔顶上放着一根尖端指向东北的5尺长木，寓意不要忘记收复东北失地。

冯玉祥的武装抗日活动，无异于给一贯主张妥协不抵抗的蒋介石政府一记响亮的耳光。蒋介石、汪精卫视同盟军抗敌保国的行为大逆不道，必欲消灭之而后快。就在同盟军与日寇浴血奋战之时，蒋、汪却肆意造谣诋毁，诬蔑同盟军“破坏整个国策”、“妨碍中央统一政令”，甚至否认有收复失地和抗日伤亡的事实。正当同盟军积极乘胜收复东北之时，蒋介石、何应钦调集16个整师、8列钢甲车和两队飞机包围了张家口，并封锁了平绥线的交通。同时，又采取“银弹”攻势，以高官厚禄为诱饵，收买同盟军中的动摇分子，从内部瓦解同盟军。在蒋介石政府和日伪敌军的内外夹攻下，同盟军处境困难，难以再有所作为，冯玉祥不得不宣布结束抗日同盟军，于8月4日抱恨离开张家口，重新回到泰山。

八、坚持抗战 奔走呼号

冯玉祥通过在察哈尔组织武装抗日活动，进一步了解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与好感，同时也感到自己知道的东西太少，有了加强学习、进一步掌握正确理论和方法的紧迫感。所以，他回到泰山后，又一次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进步书籍，聘请教育界知名人士如李达、陶行知、许德珩等为自己讲解各类学科知识。他在自己的居室内题刻了“救民安有息肩日，革命方为绝顶人”的诗句，时时激励自己不要懈怠救国救民之志。

冯玉祥不仅自己学习，还带动和引导过去的旧部、二十九军长宋哲元等人接受进步思想，增强了二十九军的抗日情绪，并为中国共产党深入二十九军做抗日将士的工作创造了条件。1935年，当蒋介石借追击红军长征部队进入四川，企图剥夺吞并四川军阀刘湘的势力，以扩充自己的力量时，冯玉祥立即派人前往四川与刘湘恳谈，劝刘湘不要与蒋介石合作剿共，而应向共产党靠拢，和共产党交朋友，积极抗日。冯玉祥的这些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刘湘的反蒋和抗日。

1935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正确主张，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蒋介石政府迫于全国抗日呼声日高的压力，不得不做出姿态，发电报邀请主战的冯玉祥出山去南京，共商大计。为团结南京政府内部及社会各阶层的抗日力量，使南京政府不致于完全陷入妥协不抵抗的泥潭，1935年10月30日，冯玉祥再次离开泰山南下。12月抵达南京，出席了国民党六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担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他在南京四处奔走，积极向国民党军政人员做工作，多次发表讲演，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这一时期，抗日救亡运动已遍及全国，而以北平、天津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尤为激烈。冯玉祥屡次写信并派人勉励驻扎华北地区的宋哲元、韩复榘等人不要被日本人所引诱和吓倒，要支持人民群众的爱国运动。宋哲元等人在他的鼓励下，为抗日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如派北平市长秦德纯同北平各院校的教授们每月举行聚会，共同讨论如何支持和维护青年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与此同时，冯玉祥在南京也积极与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著名民主人士取得联系，多方营救被拘捕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1936年11月，著名的七君子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史良、邹韬奋、沙千里因宣传抗日被蒋介石下令逮捕入狱后，冯玉祥竭力参予营救，亲自致电蒋介石为七君子的抗日行为辩护。他还曾派部下石敬亭到北平释放被捕的学生，并向谷正伦提出要求释放在北平被捕后押解到南京的100多名爱国青年。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部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企图借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机会，轰炸西安，除掉蒋介石，由亲日派掌握政权，执行彻底的投降政策。冯玉祥识破了何应钦等人的阴谋，冒着被暗

杀的危险，与亲日派作了坚决的斗争，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了积极的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冯玉祥积极响应中共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国民党的三中全会上，与宋庆龄、何香凝等13人共同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拥护农工三大政策团结御侮案》。可汪精卫等人却提出了一个坚持“剿共”的反对决议案。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冯玉祥等人的提案被通过，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主张。至此，国民党政府逐步转向抗日方面，由中共领导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冯玉祥为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7月7日的“芦沟桥事变”拉开了日本侵略者向中国全面进攻的序幕，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5日，冯玉祥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上海方向的战事，不久又改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前往河北、山东地区，指挥宋哲元、韩复榘、刘多苓等旧部对日作战。9月，驻扎桑园、连镇一带的中国军队在日寇机械化部队及飞机大炮的进攻下，节节失利，冯玉祥亲往前线督战。他决定避开敌人的正面进攻，采取侧面袭击的办法，除留一部分队伍坚守桑园、连镇外，主力部队由铁道东侧绕攻敌后的沧州冯家口——泊头。9月30日，此计划实施，10月1日晨便占领了冯家口——泊头等地，杀敌甚众，缴获大批物资并破坏了铁路。南下的敌人大为恐慌，几乎有全被歼灭的可能。但由于蒋介石并无诚意真正抗日，更怕冯玉祥和过去的部下们重新联合起来，对自己构成威胁。所以，他不但对冯玉祥的行动多方牵制而且还派人到冯玉祥指挥的地区四处活动，挑拨破坏冯玉祥和部下的关系，散布不抵抗的论调，致使我军的进攻功亏一篑。不久，冯玉祥也被解职调回南京。

冯玉祥虽被解除了军事指挥权，但仍念念不忘前线的抗日工作，他多次写信给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等旧部，鼓励他们抗战到底。他甚至表示，只要是抗战，哪怕是具体琐事自己也愿意干。他的言行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将士的抗日热情。在抗日战争期间，他的旧部如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等高级将领先后以身殉国、血洒疆场，与他的激励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冯玉祥回到南京后不久，南京政府准备迁都四川，第一步先移至武汉。蒋介石等不愿冯玉祥在他们身边宣传抗战，成为他们执行妥协不抵抗政策的障碍，便伪装出准备坚持抗战的样子，屡次委派冯玉祥前往平汉线南段以及豫西、豫东、鄂东各地视察所谓国防工事。冯玉祥沿途进行抗日宣传，动员人民群众送子弟参军抗日，发动各县收容安置从前线退下来的伤兵，甚至组织基督教会的力量来作抗日宣传及救护伤员和难民的工作。

1939年底，为出版印刷有关抗战的进步书刊，冯玉祥在武汉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创办了“三户印刷所”。“三户”之名是取“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意思，表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三户印刷所”创立后，大量印刷了《列宁全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新华日报》社论的单行本等进步书刊。同时，冯玉祥还编印了《官兵爱国问答》、《学生抗战问答》、《民众抗战问答》、《国仇问答十条》等材料，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激发军民的爱国

主义精神。在此之前，针对当时武汉政府内投降派甚嚣尘上的求和声浪，冯玉祥不仅自己四处讲演宣传必须抗战和坚持抗战必胜的思想，还约请文艺界的进步人士创办了《抗到底》和《抗战画刊》两种刊物。他尽力帮助和收容流亡的文艺界进步人士，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活动，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并独创了风格鲜明、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丘八诗”。

随着对蒋、汪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真面目的逐步认识，以及抗战实践中，对共产党言行的耳濡目染，冯玉祥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救国救民的组织，因此也逐渐把坚持抗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身上。对共产党的态度也从过去的反共转变为亲共、拥共。他先后派遣了一些人到延安学习，鼓励身边的随从人员到河南、山东等地组织民众抗日。三番五次地写信给当时在河北担任冀察战区司令长官的鹿钟麟等人，嘱咐他们不要受反共宣传的蛊惑，屏除成见，与八路军协商一切，共同抗日。他说，不管什么党什么派，只要是主张抗日的，就是朋友。大家唯一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不应该自己人打自己人。对于国民党投降派对共产党八路军以及苏联的种种造谣诬蔑，冯玉祥总是毫不留情地进行揭露和批驳，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八路军英勇抗日的事迹，为八路军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向大众公布苏联援助中国的实情，说明在国际上只有苏联是真诚可靠的。

冯玉祥抱着“对抗战大计，当说的必须说，当做的必须做”的决心，与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人妥协投降、分裂倒退的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8年10月，在一次谈话中，汪精卫问冯玉祥：“什么叫抗战到底？”冯玉祥回答说：“收复失地，不但东北四省，连台湾、琉球各省都要收回。打到倭寇投降，这就叫抗战到底。”汪精卫说“这是做梦”。冯玉祥毫不客气地怒斥说：“做梦，各人不一样：有人做梦当主人，有人做梦当奴才！”当面骂得汪精卫恼羞成怒，无地自容。

1938年10月26日，国民党政府决定放弃武汉继续西行。蒋介石在是坚持抗战还是求和妥协的问题上更加动摇不定。此时，冯玉祥正在外地检阅新兵，听消息，连忙赶赴长沙，用《三国演义》中赤壁大战前夕，孙权拔剑砍下桌子一角，警告投降派，决心与曹操决一雌雄，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来劝说蒋介石坚持抗战到底。

1938年12月23日，汪精卫从重庆出走，彻底走上了卖国投敌之路。冯玉祥大骂汪精卫是王八蛋，主张开除其党籍，并通缉严办。又写了《菜花黄》一诗，痛斥和鞭笞汪精卫的卖国罪行。他在诗中写道：

前方正抗战，汪贼意投降！
领袖欲太重，汉奸也愿当。
行年已半百，晚节末路忘。
只知富与贵，不替民族想。
千年万世名，精卫恶名长！

国民党迁都重庆后，蒋介石依然故我，多次掀起反共高潮，大批逮捕爱国志士，甚至连在广西工作的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同志也未能幸免，被抓进了监狱。这一时期冯玉祥却利用自己特殊的声望和影响，先后营救了大批被捕的爱国人士。胡志明被捕后，周恩来同志要求冯玉祥设法营救，冯玉祥一口应允。经过周密的计划，他拉着李宗仁一起当面去质问蒋介石。冯玉祥说：“首先，胡志明是不是共产党姑且不论。即使是，也是越南共产党，我们有什么权利逮捕越南共产党。其次，越南是支持中国抗日的，所以胡志明应是我们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如果把支持我们抗日的朋友当做敌人，就说明我们的抗战是假的，因此，我要问问我们的抗战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冯玉祥刚问完，李宗仁也不客气地问：“为什么要广西抓胡志明，这不是嫁祸于广西吗？这是下边的意思呢，还是你的命令？”蒋介石被问得无言以对，又害怕事情闹大，对自己更为不利，不久便下令将胡志明释放了。

长期以来，蒋介石对冯玉祥亲近共产党、靠拢人民、坚持抗战的言行就十分不满，何应钦等人更是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派出特务长期监视和限制冯玉祥的爱国言行，对他封锁消息，极力将他与各进步人士隔离；又利用手中的宣传工具进行造谣诽谤、攻击中伤，骂冯玉祥是共产党的尾巴，还指使特务给冯玉祥寄去附有子弹的恐吓信；刁难甚至逮捕与他接近的人士；降低和削减军事委员会中冯方人员的待遇，以至于使冯玉祥的生活也常陷于窘迫之中。

冯玉祥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所作的种种努力和斗争却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赞扬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也对他作出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1941年11月14日冯玉祥60岁生日时，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致电致词表示祝贺，称赞他为反帝爱国的英雄。周恩来在祝词中总结和高度评价了他前半生的历史，并为他指出了努力的方向。周恩来在祝词中说：

“焕章先生60岁，中华民国30年。单就这30年说，先生的丰功伟业，已举世闻名。自滦州起义起，中经反动帝制，讨伐张勋，推翻贿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直至张垣抗战，坚持御侮，均表现出先生的革命精神。其中，尤以杀李彦青，赶走溥仪，骂汪精卫，反对投降，呼吁团结，致力联苏，更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这正是先生的伟大处，这正是先生的成功处。

“先生善练兵，至今谈兵的人多推崇先生。五原誓师后，又加以政治训练，西北军遂成为当时之雄。先生好读书，不仅泰山隐居时如此，即在治军作战之时，亦多手不释卷，在现在，更是好学不倦，永值得我们效法。丘八诗体为先生所倡，兴会所至，嬉笑怒骂，都成文章。先生长于演说，凡有集会，有先生到，必满座，有先生讲话，没有不终场而去的。对朋友对同事，尤其对领袖，先生肯作谏言，这是人所难能的。先生生活，一向习于勤俭朴素，有人以为过，我以为果能人人如此，官场中何至如今日之奢靡不振？！先生最喜接近大兵和老百姓，故能深知士兵生活，民间疾苦，也最懂得军民

合作之利，这是今日抗战所必需。先生在不得志时，从未灰过心，丧过志，在困难时，从未失去过前途，所以先生能始终献身于民族国家事业，奋斗不懈，屹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先生的德功，决不仅此，我祇就现时所感到的写出。先生今届 60，犹自称为小伙子，而先生的体魄，亦实称得起老少年。国家今日，尚需要先生宏济艰难，为民请命，为国效劳，以先生的革命精神，定能成此伟大事业，不负天下之望。趁此良辰，谨祝先生坚持抗战成功，前途进步无量。”

这篇祝词给了冯玉祥莫大的鞭策和鼓舞，他决心为了国家民族，“为了全国同胞和全世界的人群”，更加“努力不懈不怕牺牲，尽自己的本分打倒侵略的敌人”。

九、反对内战 被迫赴美

抗日战争胜利后，饱受战乱之苦的全国各界民众渴望和平，要求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包藏祸心，他们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企图依靠暂时的军事优势，夺取抗战的胜利果实，建立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为麻痹广大民众，争取布置反动军事力量的时间，蒋介石便一面伪装和平，3次电邀中共领袖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一面却在美国的帮助下积极准备内战。为争取和平民主，避免内战分裂，年逾花甲的冯玉祥又积极投身到反对内战独裁，反对美蒋反动派的革命斗争中。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人民为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召开在校场口举行集会时，国民党反动派派特务捣毁会场，并打伤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章乃器等60多人。冯玉祥对国民党反动派镇压民主的行为十分愤慨。他不仅发表讲话进行谴责，而且还写下了《校场口》一诗揭露事件真相。除利用写文章、演讲等形式呼吁和平民主，揭露谴责蒋介石政府搞独裁打内战的反动政策外，冯玉祥还和李济深等人共同商讨，准备团结国民党内部主张和平的进步分子，形成了一个组织，与反动势力抗衡。与此同时，冯玉祥又积极联络旧部和各地的民主力量，准备武装反蒋。对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主张，冯玉祥表示了积极的支持态度。毛泽东同志前来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冯玉祥派夫人李德全前往机场欢迎。后又不顾蒋介石的阻扰、恫吓，打破从不喝酒的习惯，在自己家中用茅台酒热情款待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人。1946年春，冯玉祥获悉国民党当局企图在潢川平原诱歼李先念、郑位三所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和中原军区的第一纵队，他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并提醒中共千万不要相信蒋介石的和谈。周恩来闻讯后迅速采取措施，将部队转移，使革命力量免受了一次惨重的损失。

冯玉祥革命进步的言行招致了国民党反动派变本加厉的打击迫害。在蒋介石日益加强的高压恐怖统治下，他的处境变得日益艰难和危险，不得不考虑暂时出国，以避迫害。因此，1946年9月2日，冯玉祥以考察水利为名，远赴美国。

到美国以后，冯玉祥丝毫也没有松懈革命的斗志。1947年5月，当他得知蒋介石四处镇压国内各地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时，立即发表了《告同胞书》，抨击蒋介石政府是“坏政府”、“独裁政府”，呼吁停战和成立联合政府。《告同胞书》在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对美国社会的深入了解，冯玉祥更清楚地认识到了美帝国主义之所以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完全是为了他们自己的侵略目的和利益。因此，他和在美国的其他进步人士一道发起了反美援蒋运动。他四处奔走演讲，并亲自写信给杜鲁门、马歇尔等人，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朽，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援助。他又亲自到美国下议院拨款委员会申述反美援蒋的理由，促使拨

款委员会将 6000 万美元的援蒋款项缩减为 1800 万美元。

冯玉祥在美国进行的反蒋独裁、反美援蒋活动，有力地配合了国内的革命群众斗争和解放战争，也再次激怒了蒋介石反动政府，他们宣布开除冯玉祥的党籍，革除其公职，吊销其护照，并断绝了冯玉祥的经济来源。冯玉祥并没有被吓倒，他针锋相对地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公开信，旗帜鲜明地宣布自己将矢志奋斗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务求在中国建立真正民主和平”。

十、投奔光明 魂归中华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蒋介石政府的失败已成定局。美帝国主义者企图踢开蒋介石，重新在中国寻找其代理人。于是，他们派高级官员哈布顷去拉拢冯玉祥，表示只要冯玉祥不与共产党合作，美国愿意出钱出军火支持冯玉祥回国另组政府，妄图引诱冯玉祥走一条反共卖国的道路。冯玉祥义正辞严地说，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是我们的标准，他亲笔写的民主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是我们全国同胞的宝典，不能随便更改，更改了就是叛徒。我们只做我国人民大众喜欢的事，只说他们喜欢的话；如果说话办事都迎合美国的好恶，那就是卖国贼。我冯玉祥决不做叛徒和卖国贼！面对美国政府的笼络引诱，冯玉祥不为所动，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他坚定不移地跟共产党合作的决心。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劳动节时，向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发出了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冯玉祥闻讯立即响应，毅然决定返回祖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加入建设新中国的行列。这年7月31日，冯玉祥带领全家冲破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与阻挠，从纽约乘苏联“胜利”号客轮，横渡大西洋，准备绕道苏联回国。9月1日，“胜利”号客轮在黑海航行途中，客舱突然无端起火，冯玉祥将军不幸罹难，终年66岁。噩耗传来，举国震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及其他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各界爱国人士纷纷致函、致电表示哀悼。1949年9月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冯玉祥将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周恩来同志致悼词。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冯玉祥将军逝世周年纪念谨致悼意！”

冯玉祥将军的骨灰最终被安葬在泰山脚下。花岗石砌成的墓阶分三层，共66级，象征着冯玉祥将军所度过的66个不平凡的春秋。汉白玉的墓壁庄严肃穆，巍巍壮观，墓壁上面有郭沫若题字：“冯玉祥先生之墓”，中间嵌着冯玉祥将军的鎏金铜像，并刻着冯玉祥将军生前所写的自题诗：

我
平民生，平民活。
不讲美，不讲阔。
只求为民，只求为国。
奋斗不懈，守诚守拙。
此志不移，誓死抗倭。
尽心尽力，我写我说。
咬紧牙关，我便是我。
努力努力，一点不错。

冯玉祥将军为祖国的独立、自由、富强奋斗了一生，他的丰功伟绩和爱国爱民的精神将永远为后人缅怀学习。

